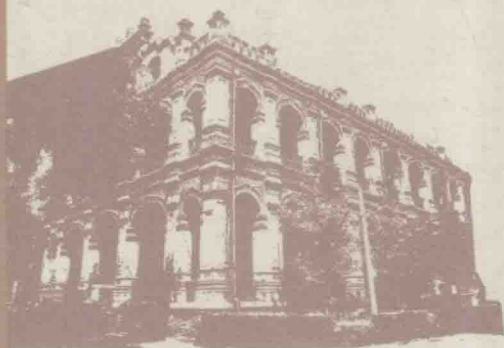


◆ 赵焰作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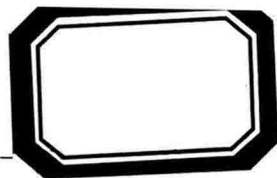
# 晚清之后 是民国

1916至1928年的中国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  
焰  
作  
品



# 晚清之后 是民国

1916至1928年的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之后是民国:1916至1928年的中国/赵焰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495-5158-3

I. ①晚… II. ①赵… III. ①中国历史-民国 IV. ①K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0444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装帧设计:赵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102600)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7

字数:360千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丘吉尔

## 楔 子

1916年6月袁世凯出人意料地死去,在中国的震动是全方位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那种属于旧时代,闪烁着重金属光芒般的威慑力和权威失去了。先是皇帝消失了,道统消失了,原先附诸偶像之上的神秘东西,如雾霭一样慢慢褪去;而现在,以权威的形式替代偶像和道统的袁世凯也消失了。仿佛一个意外结局,连袁世凯自己都没有回味过来,还没来得及伤心或者悔恨,就破碎不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民国成立后,身为共和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像一只山林中的老虎突然置身市井闹市一样困惑和悚然。袁世凯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袁世凯问留美博士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顾维钧的回答是,“共和”意味着“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袁世凯困惑

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袁世凯的担忧是,作为中国老百姓,他们能理解这些道理吗?袁世凯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会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至于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呢!顾维钧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推动发展。袁世凯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后来的顾维钧由此认为,袁世凯并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优越,而且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的转变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辛亥革命带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共和国,那种匆忙之中仿效西方建立的宪政更像是空中楼阁,甚至连倡导者也没有系统而全盘地规划,就匆匆上阵了。很少有中国人听说过共和,甚至连总统这个名称也是第一次听到,也不知道这个称谓与国家的关系,更不要说承认他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了。一切都是先天不足,辛亥革命来得如此突然,等到共和国建立,才发现根本没有机会对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对于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中国人依然陌生。英国驻华使馆武官柏来乐说:“在中国遥远西部地方的居民,对于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可能感觉不到任何差别,因为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影响到构成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车夫等的生活。扰乱给盗匪以一个大机会,他们是危险的大根源。贪污的流弊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之深,结果我怀疑它是否能在一个世纪以内铲除。”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写道:“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在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看来,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与其说人们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倒不如说人们反对的是袁世凯做皇帝。“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

的旧思想,欧美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都没有……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在庄士敦眼中,“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的说法根本不曾得到过证实,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会随着共和制的建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辛亥革命之后,很多人都满怀希望地把中国看作是“另一个美国”,但从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的组成人员结构来看,这是一座建立在沙丘之上的“象牙之塔”。它很漂亮,像模像样,不过稍有判断力的人都知道它缺少相应的基础。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到社会的基础,传统专制势力仍旧猖獗,民众依旧愚昧,“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把持政权的依旧是前清时期的官吏和乡绅。让民众们感到不适应的是,“国”不属于“家”了,没有了皇帝,“国”只是交给了一个叫作“总统”的人管理。对于所谓国会的运作,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话语,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是一头雾水。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关于美国政体的引进,实在是“迷信”的产物——引进这套体制的人,坚定地相信它会给中国带来光明的未来,故而以一种体验试验来加以改变。它是如此匆忙,也是如此决绝,少了诸多过渡和缓冲,以及相应的准备。严格说来,一套制度的引进,需要必要的准备、酝酿和试验过程,然后再以坚决的态度和足够的保证来扎实地推进。虽然这种共和的方式使得美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先进大国,但对于中国来说,也许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且伴随着无休无止的纠缠和动荡,绝不是“立竿见影”的那种。

新建立的“象牙之塔”中,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混杂在一起;坚定的宪政信仰者,与传统的权谋者厮混在一起;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与各种各样乔装打扮的卖国贼纠缠在一起。这种庞杂的组成结构,使得北京政府的任何一个举措,都孱杂着很多复杂的因素,真假难辨,莫衷一是,也使社

会推进的思想和步调不可能一致。按照出身背景和教育的不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组成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年龄组:一是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代表人物是袁世凯(生于1859年),他们当初接受的,是传统的科举正规教育,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树立的是“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这一年龄组的人,大部分是自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之后,才勉强接受宪政思想,或者在1911年后宪政成为既成事实之后才予以接受。对于清帝下野,以及宪政的施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对宪政谈不上理解深入,也谈不上坚定不移;他们信奉的,仍是传统的“王天下”以及中央集权政治。这些人大都富有政治经验,热衷于权谋和韬略,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二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在接受了相当多传统教育的同时,又普遍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其一生较晚时期才出现了新学。出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是其中代表人物。这一批人的骨架,可以说是传统的,但他们又拥有新式教育的某些血肉。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当中,许多人跟他们的前辈一样,希望政治平稳过渡,有明显保守主义的倾向。因为受到日本和西方的技术、政治、文化的影响,这部分人较善于掌握共和政体的政府形式,对于铁路经营、金融和对外关系具有领导能力。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中,这一年龄组的人占据绝对优势。第三,就是相对出生较晚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是这当中的新锐者。1905年传统科举制度被废除时,这些人很快转移到新式教育之中,他们有着比较好的新学背景,尽管这样的新学看起来只是皮毛和一知半解。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有去日本和其他国家留学的背景。由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是革命党,他们相信很快就能在废墟上建立起高楼大厦。他们倾向于抛弃中国的传统,照搬外国的思想和社会时尚。当然,以年龄为层次结构判断和归类,总有些武断或不准确。譬如孙中山,这个1866年出生、只是比袁世凯小七岁的革命家,无论从性格,还是从主张来看,甚至比小他二十岁的人更激进,更不择手段。



虽然北京政府号称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它的制度表面上看是合乎宪法的,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由法律予以区分,决策也按规定程序制定,不过中央政府的组成,以及从政者的心理,仍带有很大中国旧政治的影子,富有现代政治理想和理念的人少之又少。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人,很多时候习惯以旧的手段和方式,来推动制度的运转。很难想象没有去过西方、日本,甚至没有到过江南,只是一直龟缩在中原地区的袁世凯有着现代政治的理念和追求。孱弱的中华民国从一开始,就像暴风雨中的小树一样危在旦夕,它所面临的尴尬,不只在外部,更有内部的纠结:理性和公正缺乏,阴谋无孔不入;暴力虎视眈眈,派系无所不在。一大批个人追随者,越过法定制度的界限在运作;每一派系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人物为中心,由其吸收忠诚的追随者组成。派系领袖特别强调的是对自己的忠心不二。因此,庞杂无比的关系纠缠着政治军事和社会交往:亲戚关系、曾经的上下级关系、夫妻、师生以及同乡之类等等,这样的条、线、块牵连,就像百年成精的蜘蛛一样,在洞穴里构筑着阴暗厚实的关系网,整个中国就是硕大无朋的盘丝洞。对于领导者来说,与所任用的人之间,只有确定了某种关系,才是最可信任的,至于能干与否,反倒不那么重要。可用之人本来就少,而有确定关系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与政治高层的派系相对应的是,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势力蔓延滋长,上千种势力在划定范围,上万种思想在扯着大旗,古老而盘杂的帝国,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疫情同时流行。冒牌预言家的燕麦正在田里疯长,生吞活剥的骗子横行于世,每一个人都以为真理在手,自以为掌握了金钥匙,能使古老帝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台北张玉法先生在专著《民国初年的政党》中阐述道,从1912年2月至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党会就有八十五个,未立案的更多。1912年的主要党会团体有:民权监督党、全国联合进行会、民生促进会、平民党、进步党、政群社、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公民党、国民协会、大中党、国民公会、工商勇进党、统一国民党、工商共进社、议院政

治促成会、中国佛教协进会、中华民国竞进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社会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民党、民主党、中国同盟会、仁党、共和急进会、广东进步党、共和党、国民党等。这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政党和势力,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学会协调和合作,而是指手画脚分庭抗礼,拉大旗抢山头。一开始只是由于细小分歧所造成的不同,会随着党派纷争越来越大,造成更大的分裂。合作越来越艰难,人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和理解为中心,决不接受其他的想法和建议,哪怕相互间存在很大的相同点。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只是新生的共和国如此孱弱,就像新生婴儿,任何恫吓和蹂躏,都足以轻而易举地让她危在旦夕。

“乱世”真的来了。乱世的重要标志,是原先看似铁板一块的权威四分五裂,新的集团和新的势力应运而生。掌握着中国命脉的强权者,在“官智未开”情况下,虽然名曰踏上一条“康庄大道”,但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朝三暮四、心怀鬼胎,他们不是规矩地执行宪政,而是窥视时机尽可能寻求权力以及私利的更大化。他们奉承的,以及他们所做的,仍是数千年以来的阴谋政治。按照很多定势的说法,袁世凯死后的政治格局有几股势力:一是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新势力,他们是坚定的反帝制者,随后,这个集团的势力逐步扩展到四川和湖南。二是以冯国璋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盟,对于冯国璋来说,既反对袁世凯称帝,也拒绝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结合,这是其一贯立场。当然,最大的中心势力还是京城的北洋系。袁世凯去世之后,段祺瑞顺理成章成为北方军事势力的继承者和掌控者。不过以段祺瑞的知识体系、资历、个性和容人能力,显然还不足以像袁世凯那样服众,这使得最为庞大的北洋系处于分崩离析之势。与袁世凯相比,段祺瑞一直忠于共和体制,不过对于这种西方输入的体制和理论,同样缺少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段祺瑞所缺少的,还有大时局变化下的运气。

乱世的另一种力量,是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新生势力——企业家、商人、银

行家、教育家、律师、工程师、记者、作家等，他们一直游离于刻板的体制之外，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陆续成立了有助于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行业公会与社团，如商会、律师公会、银行公会。他们有的聚集于各级议会之中，有的散落在媒体，有的独立存在于社会。出于职业原因，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是半合作半斗争。由于政府的故步自封，他们慢慢成为体制的敌人，利用体制，忍耐体制，批判体制，直至最后忍无可忍推翻体制。他们看似一盘散沙，却富有独立精神。他们的敌人，一直就是独裁体制和军事霸权。当然，他们之间同样也有争斗，这争斗贯穿整个国民政府时期。

五色斑斓，光怪陆离；礼溃乐崩，纲常不在；百废待举，疑虑如雾。这就是辛亥之后中国的现状。如果说乱世的不可抑制一定有个罪魁祸首的话，那么，缺乏信念的支撑，即是这个乱世不可推脱的罪魁。古老帝国的民众，面对这一切时，像大洪水前的人类一样，显得茫然无力。乱世之中，精神的大陆已被洪水淹没，只留下在无边的洪水中些许山峰像小岛一样露出水面。西方的各种思潮慢慢渗透到中国所有的孔穴，直达古老民族最脆弱的地方，它可能会成为一种药方，也可能导致病变的危险。虽然可能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宪政不动摇，但对于大多数参与中国政治的人来说，他们都是投机者和骑墙派，很少有坚定的信仰者和执行者。当然，这一切也很正常，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参与者都整齐。在信念无法坚持的情况下，革命便会乘乱而起——革命一直带有含混不清的意味，它武断而不确定，否定而无法肯定。泥沙俱下的革命结束之后，很快又是一轮新的革命。否定之否定，并不一定是肯定，而是一种更混乱的否定。中国走什么样的路？中国向何处去？这巨大的、不得解的疑问，依旧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而且，数千年匍匐于专制政权下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既缺乏那种宽容、合作、磨合以及共渡难关的精神和意识，也缺乏对于自由和法制的正确理解。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掠夺别人财产，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地出门，就是实现“平等”；对别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抡起锄

刀,让别人尸首分离,就是“博爱”……以这等认识左右着走向,本身就潜在着巨大的破坏性……一切都是盲人瞎马,这使得泱泱大国在抬起脚步前进时,旁观者感到步步惊心。

从1912年到1928年,怎么都算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时代。乱云飞渡之中既然上路,就得往前走吧——谁也无法算计得出,这个古老帝国蹒跚前行,到底需要付出多少鲜血与财富的代价,以及动乱与反复的时间。

# 目 录

|                     |     |
|---------------------|-----|
| 楔子                  | i   |
| 第一章 从头再来(1916-1917) | 1   |
| 第二章 参战的风波           | 31  |
| 第三章 仲夏的闹剧           | 51  |
| 第四章 安福系的胜利(1918)    | 89  |
| 第五章 多事的春天(1919)     | 119 |
| 第六章 向左转(1920-1921)  | 171 |
| 第七章 好人政府(1922-1923) | 215 |
| 第八章 乱世来到(1924-1926) | 269 |
| 第九章 末日来临(1927-1928) | 343 |

|    |     |
|----|-----|
| 尾声 | 381 |
|----|-----|

## 附录

|                     |     |
|---------------------|-----|
| 本书主要人物简介            | 395 |
|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历任国家元首名录    | 409 |
| 北京政府历任国家首脑(国务院总理)名录 | 411 |
| 尤利西斯的凝视(代后记)        | 415 |

## 第一章 从头再来(1916-1917)

### 黎元洪就职

1916年6月7日上午,两面五色旗在北京东厂胡同黎元洪宅第门口飘扬。虽然已是民国,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的标志,其含意并不为人们广泛知晓。很多人看来,五色顺理成章应该是朝廷社稷坛中的颜色:南红、西白、北黑、东青、中黄——那是华夏土地的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少人知道五色旗的五色别有深意:它不再表明帝王对国家的私人占有,而是代表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成为“五族共和”之象征。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有人曾劝他下令将清皇室迁出紫禁城,移到热河或者奉天去。袁世凯担心此举对清廷压力过大,导致激烈矛盾冲突,拒绝此建议,只是将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办公地址,选在了紫禁城旁边的

中南海,并在临长安街的一侧开了个口,做了一个大门,取名为新华门。这样,进入到中南海大总统府,就避开了紫禁城旁的西苑门,从新华门直接进入。黎元洪继任总统的仪式,因在袁世凯服丧期间,简朴低调,没有安排在中南海大总统府,而是选择了黎元洪东厂胡同的住宅。这一所大宅,是黎元洪1915年下半年以“大德堂”的名义,花了两万银两购置的私人家产。房屋面积很大,有数百间,几乎占去了东厂胡同大部分面积。

如果不是那一天胡同两端突然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风平浪静的古旧胡同还真看不出什么迹象,一切跟以往一样。十点十分,简单的就职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声中,黎元洪身着军服,众星拱月般出现在黎府客厅内,左右两旁是段祺瑞及内阁阁员。黎元洪先向左右鞠躬示意,段祺瑞及各部长也鞠躬还礼,然后,黎发表就职宣言,表达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宣誓说:“自惟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关于黎元洪的上台,有种说法是——袁世凯刚刚去世,一向对黎元洪远而敬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兼教育总长张国淦的陪同下去黎府告知。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国淦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回报段祺瑞说:“总统过去了。”在此之后,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这一段带有漫画意味的说法来自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作为孙中山友人的后代,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的诸多情节,带有某种立场。丁中江说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见面情景,是因为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毕竟他的资格比黎元洪老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只



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也因此,出现了这一番见面时的不愉快。

丁中江所描述的这一次黎段见面,应该是6日的情景。后来,张国淦本人曾在《北洋述闻》一书中叙述道:“6日上午五点,段祺瑞拉了我要我和他一齐到东厂胡同黎副总统府去,并叫差官给副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即一同上车。在车里我问段:‘袁总统死了,应当依照约法请副总统继位。’段并不清楚新旧约法的问题,只答复说:‘我们去就是请副总统出来担任。’到东厂胡同,黎的副官唐仲寅已经在大门等候招待,唐在往里走的路上问我来意,我说:‘段总理是来请副总统担任大总统的,你快先进去告诉副总统稍作准备。’我们走进黎的办公室(东花厅)见到黎元洪,段向黎鞠躬后,黎坐在一个长桌的西首,我和段坐在南北靠近两头,黎、段相对而视,都不说话。我当时想:黎应该问袁总统故去的情况,段应该说请副总统出来担任大总统等话。平时段是拙于言词的,在有什么事情时,常常是先向我们商量到那里应该怎么说,或者旁人替他说,但现在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话了,而我在当时对这样重大的问题又不便替他说,这样足足坐了半个多钟头没说一句话。忽然段站了起来和黎握了手,然后向我说:‘潜若,你今天不要到国务院去,黎总统这里没有人,你就在这里帮忙吧!’说完后,他点了点头就走了。大总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请出来的。”

在此之后的黎元洪就任总统的布告,埋下了之后黎元洪下台的伏笔——张国淦在总统府替黎元洪拟继任总统的布告,第一句是“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根据旧约法而写的。布告写就后,张国淦即亲送府学胡同由段祺瑞过目,段祺瑞也没有提出异议,即署名盖印然后登报,并电告全国。不过在国务院所拟的故大总统令却根据了新约法,其中详细说明:“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由于